

网络社会社会分层的结构转型

张斐男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之一。在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网络社会改变着社会分层结构,加速了社会流动,改变着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重塑着社会认同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当代社会分层呈现新的特点: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出现变化;社会不平等的内容有所改变;认同感呈现多元化发展。社会分层正在从金字塔结构向“空中花园”转变,这些网络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正在影响并消解着原本的由上而下的权力结构。

[关键词]网络社会;社会分层;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160-04

一、社会分层经典理论回顾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在众多社会分层研究中,马克思和韦伯提出了两种最基本的理论模式,这两种分析框架分别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影响因素、表现形式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被称为阶级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其本质是体现在生产关系上的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马克思用阶级的概念解释了这种不平等,从而以阶级理论透视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和不平等现象。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标准不同,韦伯的分层理论强调分层标准的多元化。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韦伯开创了多元化的社会分层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似乎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因为“韦伯并非一般地讨论社会分层,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1]。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这实际上也就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表现为财富、权力和威望。

20 世纪以后,在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中,影响最大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或者社会阶层仍然是社会分层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要素。但是,阶级不仅仅是针对某种职业,而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关系。新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定义阶级概念,结合现代社会变革,重新审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分层状况。而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吉登斯,他认为人们市场能力的差别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上、中、下三个基本的社会层级,其内部还有详细分化。这里的市场能力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受教育水平、劳动能力三个方面。在韦伯理论取向的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张斐男(1984-),女,黑龙江绥化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层研究还有布劳—邓肯的社会流动模式。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的主要表现是职业分化、代际传递、教育水平、首个职业等因素影响着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

除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方向,比如社会网络理论、市场转型理论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等等。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是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与社会网络相关的概念,比如“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也被引入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之中。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是以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为背景,从中‘凸显’而出的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又根植在这些系统性关系之中。”^[2]吉登斯的观点强调了“系统性关系”对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所谓“系统性关系”,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建立的关系,也是社会系统本身所建立的结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迅速席卷全球,如果承认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当今社会就必然与以往的任何社会类型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曼纽尔·卡斯特试图将在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的社会结构概念化为“网络社会”。他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重塑了社会基本结构,深刻地改变着现有的社会模式。也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是人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一种新生的社会关系与技术的混合物。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以往的社会分层理论显然不能完全解释网络社会的分层状况。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各种特征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显现。那么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分层的哪些方面受到了怎样的影响?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正在呈现怎样的状态呢?

二、网络社会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他称之为网络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经历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它改变了已有的社会结构和人们多年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的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3]569},这就形成了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它具有自己存在的逻辑,网络社会通过特有的存在逻辑对社会分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加速了社会流动。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环绕着各种流动——例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构建起来的”^{[3]354},流动支配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活动过程,流动空间中的社会活动得以不依赖于物理上的临近而具有了存在可能。

与传统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不再局限于地理上的限制,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信息是网络社会中最重要资源,流动性的增强主要表现为各种信息的流动,覆盖了金融资本、政治权利、社会文化等等各个领域。正如工业社会中资本是决定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社会中,对信息的占有成为决定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而卡斯特所描述的流动空间这一概念,具体地解释了网络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基本变化。这种流动性使人们即使不见面,也能够进行社会交往,它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成为了可能。网络社会的这一特性使信息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正是这样的变化,使得流动性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正如齐格蒙德·鲍曼所说,“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4]在网络社会,流动性不仅仅是指空间与时间上的流动性,更多地表现为以信息资源为核心的社会资源的流动。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性已经成为对社会分层最有力的影响因素。

2. 改变了生活方式。网络社会还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社会生活具有特定的空间,具体的个体行为和社会交往发生在具体的空间中,无论个人行为还是社会活动都有着布迪厄所说的“场域”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为人类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即个体可以脱离对地理位置、社会群体、性别角色的依赖,使个体有机会重新构建自我认同,重新建立起一个私人空间。在网络社会,个体可以和远隔重洋的他人对话,可以选择年龄、性别,可以表达兴趣与不满。

“网际网路的连结功能使得公领域与私领域相互交错,打破了物理上的划分界限,但其隔离功能也容许个人以化名的方式出现在众人面前,隐匿了其在真实世界的部分或全部身份,进而在网路上重新营造自己的私领域。”^[5] 互联网技术的长足发展为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能。电子商务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方式;网络教育拓展了人们接受教育的范围和途径,使知识的传播变得更为便捷;网络休闲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和交往方式。就此,卡斯特更为深刻地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是因为这些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3]82-83} 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来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之向着人们所希望和想象的方向持续发展着。

互联网技术使人们的生活空间从私人化向着公共化拓展,使个体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群体在网络中走到一起,汇集起来的权力和声望直接改变着社会分层的秩序。在网络社会,信息技术通过改变人们的教育、消费、休闲、交往等方式,塑造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总的来说,网络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错,使整个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变得更为模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分层变得更复杂了。

3. 改变了生产方式。卡斯特在其1997年出版的《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网络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6] 网络社会的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相比,具有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征。这种崭新的经济形式改变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它所强调的信息化“通过对新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而使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效率得以实现”。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生产方式。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社会组织为了适应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组织形式,其主要的变化就是组织呈现水平化和弹性化发展趋势,这一点在众多企业的组织管理革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组织结构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方式的转变,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人们更多地运用信息化手段参与生产,因而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说,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中,工作内容本身、工作方式与工作过程都发生了改变。

网络社会生产方式的种种改变,带动了社会分层的变化。一方面,全球化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发展使得社会分层向着更加平等、联系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以信息为生产对象的组织分工使得知识与技术成为网络社会社会分层最为重要的因素,具备知识和技术的高级人才与无法适应技术发展的简单劳动者成为差距最为悬殊的两个社会阶层。因此,社会分层又有着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看似矛盾的两个趋势在网络社会却都有所体现,网络社会在加速社会分层进程的同时也使之更为复杂了。

三、网络社会的当代社会分层

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分层主要建立在阶级分层理论基础之上,到了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中国社会形成了“四大阶级”的社会分层状况,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随后资产阶级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消失,小资产阶级受到改造,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结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小资产阶级一直都是界定模糊的概念。当时的社会分层是基于阶级理论以行政干预的形式进行的强制性的分层,在随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中,中国的社会分层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虽然阶级还是不可或缺的分层标准,但一系列制度构建的身份分层逐渐占据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主导地位。一是城乡之间的分层,形成了中国持续至今的“二元社会结构”;二是城市内部的分层,城市中出现了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转业军人等很多不同身份的阶层。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的单位制是形成当时这种社会分层状况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因素。

纵观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制度和行政干预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政治因素在社会分层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分层逐渐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社会资本和声望等因素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市场经济中,大批人口流动使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中间也伴随着日益凸显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些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制约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陆学艺将其概括为

“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7]。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的引入是社会分层的主要动力,经济因素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因素是信息技术广泛传播以前影响社会分层的主导因素,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以信息为核心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则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信息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仅有20多年,但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信息技术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所不同的是,卡斯特所描述的网络社会的特征在中国并不能完全、准确地体现,这和中国建国后的发展模式、已有的社会结构体系有很大关系。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体系内,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出现变化。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传统权力阶层具有被削弱的趋势,社会事件的透明度显著提高。这在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网络事件中已初见端倪,“网民”成为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各种违法行为在“网民”的“监督”下得以纠正。虽然中央政府和权力机关仍然是社会权力的主体,但显然社会权力已经被部分分化了。原来的金字塔形状的权力分层正在逐渐扁平化,从上而下的单向度影响力也出现了逆向趋势。

第二,社会不平等的内容有所改变。以往的社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比如收入不平等、城乡差距,等等。网络社会中的不平等内容则增加了知识不平等和信息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的基础来自对信息技术和相关知识的掌握,一位不会使用网络求职信息的农民工和一位应用网络平台建立求职网站的企业家正是这种不平等中最极端的两个例子。可见网络社会的不平等最终表现形式仍然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最为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网络社会也给善于学习创新的人更多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虽然存在卡斯特所说的“职业分化”,但信息的流动带来了机会的增加,使社会阶层之间界限更容易被打破了,不可逾越的身份、地位的门槛也被打破了。

第三,认同感呈现多元化发展。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着重探讨了社会认同从瓦解到分化和整合的过程。网络空间塑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场域,使社会成员脱离了原来单向度的集体认同,有机会重塑自我认同。互联网上的个体和现实生活中个体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认同感在网络世界得以重构。网络社会中信息量巨大,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关系和能力水平,产生了不同的关注点。人们通过网络空间中的互动产生了新的认同,由此催生了无数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对社会分层产生了潜在影响。共同的认同感使人们汇集到一起,形成更具稳定性的社会阶层。

总的来说,在网络社会,原有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分层状况并未被彻底打破,社会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个社会底层人员虽然可以成为网络中的领袖,但现实生活中他仍然不能摆脱已有的社会系统的控制。但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就像原本搭建在沙漠中的金字塔被改建成了“空中花园”——金字塔的形状还在,但在金字塔底部和金字塔内部都出现了一团团的雾状结构,使金字塔远远望去更像是古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这些雾状结构就是在网络社会特有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的小利益团体,或者是具有共同兴趣的小团体,它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整个金字塔结构,但它们正在影响并消解着原本的由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毋庸置疑,这种改变是不可以逆转的。但最终它们能否真正彻底改变社会分层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1).
-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66.
- [3] [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4] [英]齐格蒙德·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
- [5] 黄厚铭.虚拟社区中的身份认同与信任[D].台北: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2001:119.
- [6] [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54.
- [7]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前言.

(责任编辑:常延廷)